



2014 年春季刊

团属 108A 号

《经纬》编辑委员会

顾 问：李寒梅

总 编：祝诣博

副 总 编：高 静

执行总编：王天白

主 编：鲁 蕾

副 主 编：王康威

宁雨轩

执行主编：周玫琳

编 辑：边 旭

孙 冰

张 纤

梁筱璇

李婷婷

李慧文

朱宣澔

E-mail :

pkusisnewscenter@163.com

国际关系学院团委

➤ 特别策划

文化软实力	鲁 蕾	2
梅然：昔日帝国与贵族精神	周玫琳	3
张小明：韩流背后的国家软实力	张 纤	8
余万里：从《纸牌屋》看美国政治	孙 冰	12

➤ 专栏文章

马航：理性的反省	王康威	17
从中国文物流失看文化软实力	边 旭	19
丝绸之路经济带，没那么简单	鲁 蕾	24
中国流行音乐中的民族化现象	王天白	28

➤ 编者的话

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	王天白	40
-----------	-----	----

特别策划：文化软实力

鲁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1 级本科生

1990 年，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瑟夫·奈首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冷战结束后，“软实力”随即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超级大国在保持“硬实力”优势地位的同时开始更多运用“软实力”来发挥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各强国和新型国家也越来越多地重视提高其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以求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抢占先机。根据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即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权力，而文化吸引力则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文化”一词蕴含着太多的意义，从琴棋诗书到国民精神，从社会风俗到文化产业，“文化”既能阳春白雪供人欣赏玩味，又存在于我们的身边与生活息息相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文化还离不开它的社会环境，从趣意盎然的文化现象中我们往往能够窥见一个国家的历史沿革、经济现状与政治生态。例如，英国留存至今的贵族精神的形成与其强大的议会制度密切相关；近年来韩剧的盛行不仅仅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哈韩”这样的韩国文化的风靡。而厚黑神剧“纸牌屋”则以夸张的艺术形式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刀光剑影”。

让我们将视线转回中国。由于历史因素，我国有大量的文物流向了世界各地，这对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何以合理的途径索回我国流失文物，成为我国，也是世界文物界的一个难题；近年来，各类音乐节目在国内各大卫视播出，给观众带来一场场视听盛宴的同时，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民族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本期《经纬》除了与您分享文化与软实力的分析外，还将探讨上半年度的部分热点事件。马航事件的发生在带来悲痛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学会以理性的方式在灾难面前进行跨国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不仅仅是为了开发中国西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更是中国在面临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封锁下拓展国家空间、以外部合作“倒逼”内部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昔日帝国与贵族精神

——梅然老师漫谈英国文化

周玫琳 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英国，一个身处欧亚大陆终端却将触角遍及世界的传奇岛国。大西洋的海风拂过这片栽培了璀璨群星的土地，在多佛尔海峡的白色峭壁回应彼岸激荡的文明。当历史随着工业化的车轮滚滚向前，此处的田园牧歌终于变奏为一支日不落帝国的进行曲。尽管两次大战的枪林弹雨和权力格局的斗转星移让这曾不可一世的国度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今日的英国虽身披落日余晖，却依然以其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底蕴，光芒四射。



俯瞰泰晤士河西岸 2013 年夏·摄于伦敦眼

而在北大国关，一门叫作“英国政治与外交”的专业限选课也在历经学生间多年的交口称赞后，闪烁着独特的光芒。而讲授这门课的梅然老师——同学们亲切地称之为“梅帅”——也因其博古通今、热情洋溢、幽默风趣的授课风格而广受同学们欢迎。

记者前去采访梅老师那天，正值乍暖还寒的早春午后，但他似乎完全不为恼人的“春困”打扰，始终给人以精力充沛的印象。梅老师笑称，他讲授英国课程就像话剧表演：视讲台为舞台，进入社会科学教育的情境，向同学们传达鲜明的学术见解与合理的逻辑解释，即为精彩授课之道。

在讲台上，梅老师总是青睐从历史的角度、用比较的方法来解读英国政治与外交。而谈及英国文化，他也喜欢追溯历史沿革的轨迹、对比不同国家的经验，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一番见解，愿

与《经纬》的读者们分享。

民族性格：理性克制与包容尊重

谈及英国文化，梅老师首先谦逊地表示，文化一词是如此意蕴深厚，以至于真正的学者都不该自诩为“文化学者”，而异乡的观察者就更难把握英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道出了自己眼中英国文化的核心——理性、沉稳、非激进、非极端的民族性格，而闻名遐迩的贵族精神，正是其典型的表现之一。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如此民族性格延伸出了英国的许多特点，例如在在军事战略和外交上愿意妥协、寻求平衡，国内较少有大规模流血冲突、相对稳定，这些进一步为后来的工业化与崛起提供了有利环境。在学术研究上，这样的民族性格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英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都十分出色的理论水平，他们的理性与严谨有利于学术创新。在工业生产上，英国也以精雕细琢闻名，劳斯莱斯公司即为代表：英国汽车业虽在规模生产上拼不过德国、日本，但劳斯莱斯汽车却始终是高贵、精致、隆重的代名词；在航空发动机制造这一高精度、高难度的领域，劳斯莱斯也至今和美国通用并列为王。总体而言，英国的这种民族性格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繁荣。



由英国作家 Ford Madox Ford 的小说《Parade's End》改编的同名英剧（2012）讲述了一名恪守道德、正直理性却忍辱负重的贵族绅士在一战硝烟与时代变迁中的坚守与改变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这样的性格使得英国缺乏对压力的感知和进取心，不利于英国保持工业化之后的竞争优势。换言之，英国虽然是工业化最先开始的国家，却并不是最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国家，在历史上，这种缺点决定了英国制造业后劲不足的发展路径，甚至 20 世纪后的衰落甚至沉寂。

在这种总体的民族性格之中，还有一些具体的特点，尤其突出的是英国各阶层间较显著包容乃至尊重。任何国家都有阶级存在，都有穷人富人、精英平民之分，但在类似的条件下，中国有仇富心理、法国有革命怒火，而历史上英国劳动阶层对贵族阶层所享有的经济政治权利却通常怀有较高的认同，且这种认同往往表现为效仿。不仅是过去，即便是在贵族制度早已衰落的现代，靠《哈利波特》系列盆钵满溢的 J·K·罗琳也会在发家后早早地购置一幢苏格兰乡间别墅——这可不只是一栋大房子，更是贵族的生活方式。这种延续至今的效仿不仅体现了对贵族生活方式的认可，还从侧面印证了历史上英国贵族统治的合法性之稳固，但这只是劳动阶层一厢情愿的尊重吗？

作为一个理性克制的民族，英国阶级间相对显著的包容尊重显然不是无源之水，不只基于下

层的理解与认同，向上溯源，梅老师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国家曾经的主要权力阶层——英国贵族。

贵族精神：荣誉、责任、勇气、自律

梅老师对比了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阶层后认为，英国贵族总体上是一个相对朴素的群体。这从两国的王室和贵族建筑上就可见端倪；法国有极尽奢靡的凡尔赛宫，而英国的白金汉宫、汉普顿宫等宫殿在华丽程度上，和欧洲其他王室的许多宫殿都没有可比性。虽然英国贵族曾是英国社会的主导者，但在生活方式谈不上奢华。

为什么英国贵族会形成这种特色呢？有学者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有议会的强大制约，这种两院制的制约不只针对王权，也针对贵族权力。例如，在议会决定征税相关议题时，税收不仅要平民承担，也要贵族承担，这和法国有很大不同，因为法国贵族是免税群体。最富的人免税，最穷的人交税，这岂不是天大的不平等吗？这可以简单解释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百姓对贵族老爷们的仇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对立面解释英国阶层间的包容尊重。

英国的长子继承制也间接导致了英国贵族的朴素作风，因为这让英国的贵族家庭在财富上的显赫程度相对较弱。这一制度在英国践行最为彻底：同是贵族家的儿子，长子可以继承家产，而次子则难分一杯羹，因此就成为了一名“穷贵族”；为了生存他必须努力，去成为优秀的军人、官员、法官、牧师，或去经商、探险，这种不可回避的奋斗让他相当接近大众群体。这种故事在英国贵族中屡屡上演，进而导致了英国贵族亲民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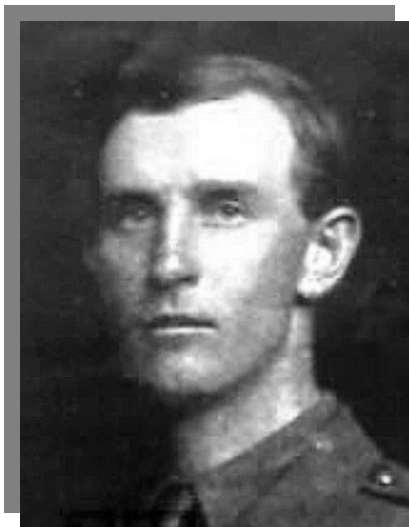
尽管有华丽的艺术指导、一流的剧组和精良的制作护航，但捧红了英剧《Downton Abbey》的，终究是那一缕甚至超越了国界的关于英国贵族的情结。

利·阿斯奎斯的长子雷蒙德·阿斯奎斯就是其中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梅老师还认为，英国贵族自身的追求也是他们生活相对朴素、贵族精神得以彰显、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因素。英国贵族希望能够履行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如从政、从军，以此成为平民的表率。他们在各行各业中也有显赫的成就，让百姓看到，贵族不只是享受安逸、爱慕虚荣的，更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人。

一战期间，毕业于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贵族子弟大量从军，他们大多成为下级军官，带领连排级军事单位冲锋陷阵，伤亡数字令人痛心，甚至导致了后来英国贵族的整体衰落。一战时任英国首相赫伯特·亨

雷蒙德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不仅是首屈一指的“学霸”，还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反战运动的领袖，方方面面都出类拔萃。他被旧相识温斯顿·丘吉尔评价为“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未来的又一任首相。但当一战爆发，雷蒙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参军，响应其父亲和祖国的号召，最终在索姆河战役中阵亡。他的墓志铭出自莎士比亚陛下，短短一句概括了他的一生——“这是一颗活得短暂但生得伟大的英格兰之星”。雷蒙德虽然只是贵族中的一个个案，但也代表着这个崇尚荣誉、责任、勇气等价值的整体。



雷蒙德·阿斯奎斯 (Raymon Asquith), 1878-1916

在平民主义潮流早已深入人心的现代，英国贵族人数减少，影响力也大不如前，甚至有如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那样为了竞选而拒绝被分封贵族的先例。渐渐地，贵族爵位演变成了授予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等杰出人士的荣誉头衔，不再世袭，也就不再有贵族门第，真正意义上的贵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今天的英国，贵族精神还在，对荣誉、责任、自律、勇气的追求还在，并且这种精神已不限于贵族阶级，而是渐渐整合为一种英国民族的气质。当今天的人们效仿过去的贵族购置乡间别墅，他们追求的并非是贵族阶级的标签，而是与贵族精神相连的一种情愫，一种为英国人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乡村象征着前工业化时代，象征着没有工厂、没有烟囱、没有污染、没有机器轰鸣、没有物质主义的田园牧歌一般的时代，那个时代保存着人类最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情感。这不只是贵族的追忆，更是属于英国的怀旧。

今日英国：文化软实力的再创造

时至今日，英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已是明日黄花，但英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仍在潜移默化地持续着。梅老师也列举了他心目中魅力犹存的英国文化符号，其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也正植根于此。

梅老师认为，英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优势依然是英语。作为唯一堪称世界语的语言、最基本的软实力，英语为英国带来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学习英语的人口众多，学生在考虑海外留学时往往会首选英美，而一旦在英国居留较久，很可能就在政治上成为亲英人士或回国后的亲英派，这对英国显然有长远的益处。不仅如此，英语还会间接地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英国音乐、影视等文化产品，进而促进文化产业，可谓是连锁效应。

英国优秀的高等教育是其文化软实力的又一重要载体。不同于英语潜移默化的影响，英国对高等教育的扶植上升到了国家战略——英国政府有意识地在政策上增强英国高校的海外吸引力，也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在这一点上，看中国学生的英国留学热就不难理解了：目前，在英国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已经达到 8 万名，而在英国留学的全日制中国研究生学生数几乎与英国本地研究生一样多，超过了 3.8 万。

发展旅游业也是英国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一种途径，毕竟，英国数不胜数的教堂、宫殿等人文风光，都是承载着文化的载体。如今，尽管正式政策尚未出台，但英国确在考虑申根签证在本国的适用性，以进一步推动本国旅游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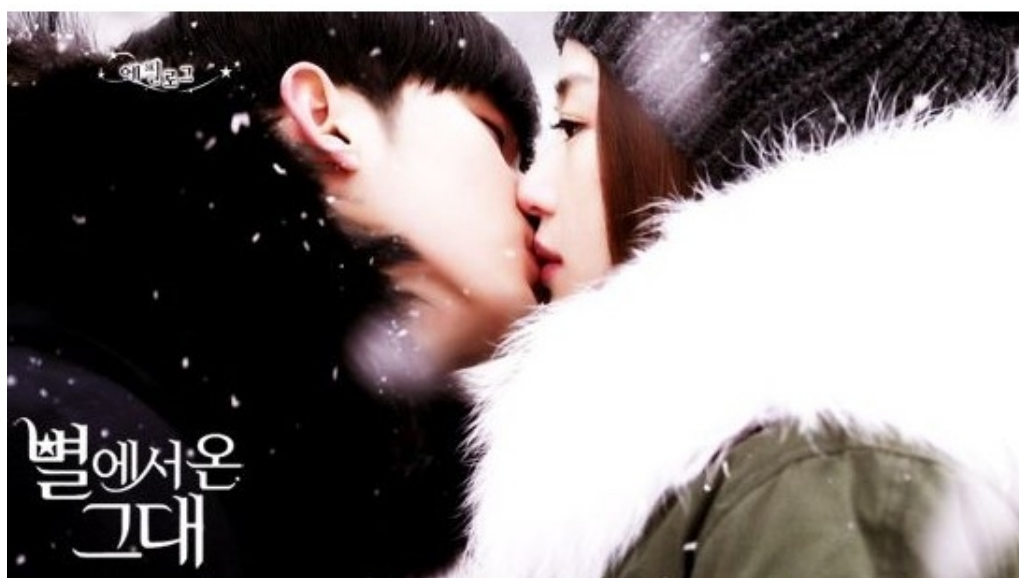
在稳定君主立宪制下，英国王室已然成为英国的又一大文化符号，进而成为英国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在当今英国，是否要废除君主制仍在争议之中，而保皇派的一个有力论据就是王室作为文化象征与符号的积极作用。不得不承认，即使身居虚位，总是着彩虹版绚丽服装的女王和刚诞下小公主的威尔士王子夫妇等王室成员，始终是英国一道亮丽的风景。

诚然，当代英国发挥文化影响力、以文化促发展的途径并不限于梅老师提及的这些方面，为英国文化的特征定下统一的描述也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可以确定的是，英国这个神奇岛国的文化魅力还远远没有终结，纵使日不落帝国已成往事，贵族精神与理性克制的传统却在今天散发着依然独特的光芒。

“韩流”背后的国家软实力

—访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老师

张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2013年初，一部《来自星星的你》风靡全亚洲，让无数人着迷。唯美的画面、帅气漂亮的演员、曲折的情节、细腻浪漫的感情，无一不是看点，而这通常都是韩剧的必备元素。从最初的《冬季恋歌》到《浪漫满屋》，再到如今的《继承者们》和《来自星星的你》，韩剧在中国可谓是火了数十年。韩剧作为韩国文化实力的突出表现，提升了其文化自信，同时为其带来了巨额利润，并把韩国传统文化、饮食、服饰、韩国产品和旅游等绵绵不绝地推向了全球，可谓一举多赢。韩剧在中国甚至是东亚的流行仅仅是影视剧本本身的成功么？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对此，笔者很感兴趣。为此我专访了我院的张小明老师，从韩剧着手，对文化软实力进行了新思考。

在谈论我们眼中的韩剧的魅力时，张小明老师表示，韩剧的火热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好几年前所谓“韩流”就以风靡之势席卷了东亚市场，在中国更是大受欢迎。张老师曾经也看过《名成皇后》、《大长今》、《我的野蛮女友》等韩剧，认为韩剧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国际巨星，如裴勇俊、金喜善、李英爱等等。而最近的《继承者们》、《来自星星的你》也捧红了金秀贤、李敏镐等新星。在中韩关系相对比较好的大背景下，由于自身画面唯美、情节简单，韩剧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吸引了一大批观众。

对于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软实力”（soft power）命题，张老师指出文化和软实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有多种来源，如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等等，而其中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是其重要来源。文化则包含很多层面，最高层面应当是价值观的信仰，另外还包括语言、文化产品等。如“外语热”现象和影视剧的流行。一个国家的文化扩散和软实力的提高需要在很多方面有所行动，其中文化产品的输出就

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这要求该国有比较高的层次和制作水平。为什么韩国能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中国影视业学习和探索。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异国生产的文化产品不仅应当在国内有观众，走向国外也需要有市场。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部分产品，如 90 年代的《渴望》、《还珠格格》以及当下的《甄嬛传》等。但是和韩剧比起来，我国的影视剧影响力相对较弱。在日本、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都流行韩剧，但是我国的国产剧市场就显然没有这么宽泛。

然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韩剧的社会评价并非全是正面的。部分观众经常批判韩剧没有内涵，情节简单，与美剧、英剧相比不上档次，不够高端。对此，张老师认为，文化产品没有高低，它的主要功能是娱乐。韩剧定位相对通俗，这是无可厚非的。此外，相比国内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较多禁忌，韩国因为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而生产了品质相对较高的综艺节目、影视剧等文化产品。我们需要反思，如何才能激发文化产品生产者的创造性？在中国的环境中，生产“抗日神剧”容易，相对安全，且有市场。文化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是相互的，观众的口味和兴趣是生产者必须考虑或者迎合的，但更高明的生产者会引导观众。这种相对智慧的生产，需要生产者有一定的创意。不仅是文化产业，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甚至在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

但总体而言，韩剧作为文化产品之一，是相当成功的，它的成功不仅造福文化产业本身，更是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一部“星你”使得炸鸡和啤酒畅销，韩剧主演的剧中衣服同款在淘宝上引起热卖，济州岛成为年轻人旅游的新选择，饮食业、服装业、旅游业等等都因为韩剧的流行而有着不小的变化。以 2002 年的韩剧《冬日恋歌》为例，韩国经济研究院在《韩流现象与文化产业战略》报告中指出，其为韩国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3 万亿韩元（约 29 亿美元），其中，旅游业等收入 1 万亿韩元，产品输出收入 2 万亿韩元；仅发行裴勇俊画报和《冬日恋歌》专辑的出口值就高达 1000 亿韩元，而 1300 亿韩元的文化娱乐商品价值，就相当于韩国出口 13101 辆汽车的总金额。对于这一现象，究其实质，我们可以归于文化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相互作用。对此，张老师认为，约瑟夫·奈在提出软实力和硬实力时的弊端正在于此。两种实力的区分界限并非绝对清楚明显的，而这种边界的模糊是无法克服的。此外，对于软实力和硬实力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问题，一国该如何平衡？这是非常复杂的，非一言可概之。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韩剧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编者了解到，韩国“文化立国”的政策推动了韩剧等影视产品的出口，韩国政府不仅在国内不断通过各种政策、机制的完善助力娱乐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在韩流文化向全世界范围的传播中，担当起了保驾护航的重要角色。这其中的作用到底何在呢？张老师认为这种将功全归于政府的说法是偏颇的，韩剧影响力的强大在于产业链条的完善、制作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而不在于政府投资。除了韩剧外，美剧、日本动漫的成功，都体现了同一道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提高不应当由政府扮演主要角色，更需要的是非政府的努力。中国人有个很普遍的误区，认为文化输出是政府的事情，因此大家期待政府完成所有事。但这是很不科学的，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化产品的制造，都不能过于关注政府的作用，主要还是在于个体的劳动和创造。政府老想着引导、干预的话，反会适得其反。我们应当强调文化产业链条本身对文化输出的作用，给予生产者足够的创造空间，才可能产生优秀的产品，而这恰是中国环境所欠缺的。

除此之外，我们应该看到韩剧在东亚市场上的流行，体现的也是东亚共同文化的枢纽作用。韩剧之所以那么容易被中国观众接受，与它所体现出来的行为规范、家庭伦理等传统的东西是息息相关的，与中韩共处于一个大的儒家文化圈内是密不可分的。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圈是促进东亚国家相互交往的一个积极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太夸张东亚文化的共同性。上文提到过，文化包括语言、科学技术、艺术，但还包括价值观信仰。尽管都有汉字，东亚国家的具体语言形态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价值观信仰也不相同。因此东亚文化共同体在文化的某些方面是相同的，但在很多方面仍体现了很大的差异性。对此，我们要重新回过头来看文化的概念。如果夸大东亚文化的共同性，这就可能导致我们无法理解东亚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对此，香港某媒体曾经提出过“增强文化软实力交流以缓解东亚紧张局势”的说法。张老师认为，且不论这一举措的成功性大小，其手段本身就指的考究。该说法把文化看得过于工具性，以文化作为追求某目标的手段，本身就太功利。文化交流是自然形成的东西。一个国家文化上的吸引力是自然而然的，不能刻意去把它当成追求某具体目标的手段，这就是文化交流的特色。刻意地把文化当成对外政策的工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此外，韩剧受捧和大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中日关系、中韩关系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影视剧市场的走向。韩剧并非一直火爆中国市场，日剧也曾经风靡我国。而近年来中韩关系较为友好，中日关系相对紧张，这导致了日剧近年来在中国市场萎靡，而韩剧却火热异常。

作为东亚关系研究的专家，张老师对此简要分析了一下东亚局势。他认为，中日韩作为东亚的三个核心国家，倘若三国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东亚局势就会不稳定。而这三者中，中日关系问题较大，中韩关系相对不错。三者关系的复杂，与多种因素相关，是一个演变过程。尤其在中日问题上，日本认为中国具有扩张性和威胁性，中国则认为钓鱼岛国有化是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张老师前些日子参加了中日韩的三国论坛，论坛上各方在历史问题上争论不断。但张老师认为，历史问题本身不是三国关系紧张的关键和实质争论点，它只是一种象征。历史问题表象背后隐藏的是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等问题。比如，日本作为第一个进入西方国际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很多领域领先于中韩两国，其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使得日本不愿意向中韩妥协；而中韩的相处过程中，中国在东亚历史上的朝贡地位使得它也有一种优越感，这使得韩国有着隐隐的不满。中日韩三国之间缺少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民族情绪比较强烈，且三国的国内政治也不太稳定，这就导致了东局势的风云变幻，此起彼伏。而在这样的局势下，韩剧最后走势如何，也是难以预测的。

总之，软实力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很重要的。文化是软实力的主要来源，而文化产品则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产品的提高需要更高的制作水平，需要生产者不仅仅满足于国内市场，而将眼光投向海外市场，需要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韩剧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并且一步步走向了成功，在亚洲甚至是北美都有它的坚实受众。而这归根结底都不在于本国政府投资了多少，而在于文化产业的激烈竞争和文化产品链条的完善。在东亚文化共同圈内，韩剧的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何提高中国的文化产业制作水平，使自己的文化产品具有吸引力？这也将是一个不断探索、永无止境的命题。

从《纸牌屋》看美国政治

HOUSE of CARDS

孙冰 国际关系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纸牌屋》简介：

《纸牌屋》由大卫·芬奇、鲍尔·威利蒙联合制作，凯文·史派西主演，改编自英国同名小说，是Netflix的首部原创剧集。在2013年艾美奖上有9项大奖提名，并最终斩获最佳导演和最佳选角两项大奖。同时这部剧集还引发了亚马逊、微软等公司对投拍互联网剧集、消除正规电视剧与在线电视剧差异的兴趣。

著名互联网媒体人张守科评论：反英雄的剧集展示了美国政坛的黑暗，而观众愿意相信真实的美国政坛比剧中更黑暗，这才是《纸牌屋》走红的心理基础。

从《纸牌屋》透视美国政治

《纸牌屋》的大热，不仅在于剧集制作的精良，还在于深厚的群体心理基础。在《纸牌屋》里，不仅完全没有道德层面的“好人”，连遵纪守法、照章办事的人都几乎销声匿迹。男主角弗朗西斯·安德伍德是个老奸巨猾的政客。第一季里他从党鞭(国会多数党督导)爬到了副总统位置，第二季里继续党同伐异，向权力巅峰冲刺。而他周围全是同类，为了获取权力，每个人都可以采取包括诽谤、贿赂、谋杀在内的一切手段击倒对手。这里当然有为了增强戏剧效果的夸张，但也做到了细节真实。在广大民众的视野里，权力运行是神秘的“少数人游戏”，只能从政治剧集里窥视冰山一角——《纸牌屋》之所以走红，正是因为满足了这样的心理期待。

《纸牌屋》在中国最大的贡献在于带热了一个中文世界里原本没有的词汇“党鞭”。在第一季中，主角安德伍德的身份就是“党鞭”，主要工作是监督本党党员按时出席重要的投票活动，并且按照政党集体的意志投票。

在英美议会中，各议员都必须向本选区的选民负责，但是当选区利益与全党利益发生冲突时，选区涉及的议员就会摇摆，甚至在投票时加入敌对阵营。这时就需要有一位党内的强力人物或权威人士出面“摆平”这些人，维持党团纪律。

在第一季中，安德伍德为了令教育法案



通过，不断地与议员们进行博弈，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进行利益交换。另一个手段就是抓住对方的软肋进行威胁，逼其就范。如果他没有弱点，那就给他设计一个。第一季中，当工会领袖无论如何都不同意议案，安德伍德就故意用粗鄙语言挑衅，直到工会领袖情绪失控打了他一拳。在美国，袭击国会议员是重罪，铸成大错的工会领袖才不得不妥协。第二季中安德伍德察觉记者佐伊的同事不断追查自己，便设计陷害这名记者，不但毁了他的调查，也毁了他的人生。正是安德伍德对党内议员这种超强控制力，使他在第一季里成功推动了教育改革法案，并在第二季里运用议事规则强行推动福利改革。

美国政治结构初解析

美国国内两大党派分别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民主党的党符是毛驴，共和党的党符是大象。从政治立场来看，美国民主党往往是中间偏左，而美国共和党的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右。在政治主张方面，两党也存在明显的分歧。民主党支持全民医保、同性婚姻和枪支管制。共和党得到工会支持，票仓主要在北方。而共和党反对全民医保，不太支持同性婚姻，捍卫枪支自由，得到了商团体的支持，票仓主要在南方。

民主党派系主要包括保守派、中间派、自由派、进步派及自由意志主义者等。保守派反对堕胎和全民医保。中间派要求减税，减少财政开支。自由派则反战，支持全民医保。进步派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打击企业犯罪，主张富人加税和从伊拉克撤军等。自由意志主义反对枪支管制、毒品管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财团补贴和干涉主义。

共和党的党系主要包括传统主义、部分保守派、温和派、自由主义和部分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传统主义者要求低税和财政低赤字。保守派要求减少财政开支和经济监管，反对堕胎，认为同性恋是犯罪。温和派则主张平衡预算，降低税率，自由贸易，放松管制，自由改革。自由主义者多为堕胎和同性恋婚姻的支持者。自由意志主义者强调自由市场，市场控制要求最低限度，外交政策不干涉。

由此可见，美国的两大党派以及其中的各个党系之间联系密切，权力和利益关系复杂，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美国政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会和参众议院。国会有立法权，主要职责包括宣战，招募及维持军队，制定美国法律，表达选民意见，监督行政分支，解决国内冲突，推广选区，解释提案等。美国参议院有 100 名议员，每州两名议员，代表各州的权利平等。参议员任期 6 年，2 年改选 1/3。民主党在参议院中是多数党。美国众议院有 435 名议员，按人口划分，代表每人的权利相等，议员任期两年。在众议院中，共和党是多数党。

余万里老师论美国政治

1. 小政府，大社会

在这一部分，余老师的讲座引用了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政治》中的一段话：

“我一直认为，有助于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原因，可以归为以下三项：

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

第二，法制；

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

美国位于北美大陆，相对而言远离政治活动频繁的地区，有避免国际政治纷争的先天优势。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和维护有着重要的帮助。对于美国民众的思想观念，余万里老师罗列出以下几点要素：对自由的珍惜与对政府（专制）的敌视；天然的平等观念；言论、结社自由与小市镇自治传统；法制观念。美国政府的运行和政治权力的制约平衡与美国社会的特点和传统息息相关。

余老师提出，“小政府的核心是有限职能”。美国联邦、州、县、市四级政府共有公务员 1963.1 万（不含军队），联邦 282.4 万，州 439.9 万，县市 1240.8 万。包括各级政府官员、警察、消防、以及公立学校、医院、科研机构人员，官民比为 1:12。而中国狭义的公务员。各级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数量为 1053 万人，官民比为 1:122。

中美两国进行比较，首先是政府管理结构不同：美国是分层管理，中国是条块管理。其次，政府管理的职能不同：美国是有限政府，存在必要的恶；中国是无限政府，讲究以德治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是民主的首要问题。

2. 分权制衡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说来也奇怪，即使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要任何政府了。——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

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无论是一个人，多数人或多个人，均可公正的判定是虐政。——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

对于美国政治，有这样一种描述，“帝王般的总统、贵族式的参议院、平民化的众议院以及九长老的最高法院。“这种描述形象的阐释了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各个重要部分的地位和现实。

民主政治的现实是多重的少数人统治。罗伯特·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写道“民主的真正问题在于大多数普通民众并不关心政治。比起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家庭、健康、朋友、休闲等事

务而言，政治只是生活大戏中的小插曲。”

多元主义（polyarchy）民主指的就是：有多数人参与的多元集团通过影响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管理过程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在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游说（lobby）、选举捐赠、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美国政治的走向。

3. 美国国会：“政治游乐场”

国会是美国的政治中心，掌握立法权、财政权、人事批准权。国会委员会，分为常设委员、小组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还有大量非正式的议员连线（caucus）。

政党在国会中的权力结构：多数党、少数党；资历、政党领袖和党鞭。

国会的运作策略主要包括：滚圆木（logrolling）、猪肉桶（pork barrel）、无限制演讲（filibuster）、燕尾效应（Coat-tail effect）……

议员助手主要从事立法研究、决策咨询、协调沟通、帮助竞选等工作。议员助手群体被称为“影子国会”。

4. 政党与选举

美国的政党制度是以选举为核心的。美国的“党校”，主要传授竞选实战技能。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在美国历史上，44位总统中有22位当过州长。例如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为了从政，他从哈佛大学回到芝加哥当社区义工，最后成功竞选美国总统。美国政党选举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一朝当选，鸡犬升天。美国政治中总统权力较大，总统可以直接任命9000个岗位。总统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和顾问成为政府的高管。这一现状在《纸牌屋》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5. 安德伍德的影子：林登·约翰逊

余万里老师在这一部分介绍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美剧《纸牌屋》中的男主安德伍德的人物——林登·约翰逊。他从议员助手起步，最后登上总统的宝座。他也是国会大师，擅长“零售政治”。他也是立法大师，落实了当代美国最伟大的变革。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是美国第36任总统。他于1908年8月27日生于德克萨斯州中部草原。约翰逊家族曾参与了约翰逊城的建设。约翰逊在任时提出了与“新政”、“公平施政”、“新边疆”一脉相承的改革计划。他的



功绩主要表现在通过了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医疗补助制度、民权法和选举权法，国内政策成绩斐然。由此，约翰逊在一些史学家对历届总统的评价中依然获得高排名。

6. 思考：如何评价政治人物？

“道德与政治目标的权衡，负责任的伦理，对职业拥有强烈的热情，将自己的情绪好恶与实际目标区分开来。——马克斯·韦伯《政治为业》”

余万里老师在他的讲座的最后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政治人物的评价是一件极其需要智慧的事情。政治人物是指为公众事务服务的人。对于安德伍德在剧中的行为应该如何评价？什么是大政治？什么是小政治？何为大道德？何为小道德？如何面对“政治为业”这个话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深思考。

一部美剧带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它所展现的那些利益纠纷、权力倾轧和爱恨欲望。作为一名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我们应对其中的政治现象进行深刻思考、理解和研究。

看剧容易，理解不易，且追且珍惜。

马航：理性的反省

王康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我简单地计算了一下我在过去两年花在空中的时间：3 次往返新加坡和北京、1 次北京到香港、1 次香港到台北、1 次台北到新加坡。在空中逗留的时间总共大约 46 小时，所涵盖的距离将近 3 万 3000 公里。

问我在中途有没有感到不安？应该没有。除了起飞和降落之际总是在胡思乱想（仅仅是因为空难电影看太多的结果），但是基本上不论搭乘哪一家航空公司，我似乎都对飞行感到绝对放心。即使时有空难的新闻，但总是觉得离我十分地遥远。

若是按照统计来说，飞行应该已经算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了。平均来说，一个人有 1,100 万分之 1 的机会在空难中丧命，却有 5,000 分之 1 的机会在交通事故中丧命。

飞行器的发明应该是我们迈入现代社会的最好的象征之一，特别是高速喷射机的出现。飞行曾经看似如此遥远，是上千年来，人类所拥有的梦想，也是人们为之努力不懈的一个目标。它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

在现代化的世界中，飞机更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飞机就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距离缩短的最重要的象征。我们从未能够如此轻易，如此频密地和远在世界另外一端的人进行交流。有了飞机，外交的性质变了，世界村的概念才真正能够实现。

不过，飞机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正当我们为人类的技术创新感到骄傲的同时，空难的消息无疑会将我们拉回现实。

这次空难牵动着全世界几十亿人的心。飞机上的乘客来自五湖四海，从中国到马来西亚甚至是持有假护照的伊朗人。一架小小的飞机上或许只有 200 多人，但顿时牵动了那么多国家和无数人的心。



每天报纸的头条，每堂课老师的讲评，甚至是茶余饭后的讨论，想置身事外也不容易。我们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都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民，天下事都宛如自己的事。希望这是一种积极的效应，我们不再只是关注身边的事物，而是拥有一种更广阔的胸怀。

回过头来看，本次事件最让人不解的地方便是空难的性质。从一开始的纯属意外，发展至后来的种种阴谋论的沸沸扬扬，但后来又判定为意外，过程波折重重。搜索也是如此：从一开始的南中国海，再到印度南部海域附近，到最后锁定南印度洋。旁观的我们也不知应该相信什么了。或许正是这些引发了许多网民们通过自己认为正义的渠道来“追讨说法”。

在人民的愤怒之下，各国政府不断地向马来西亚当局施压。马来西亚不能以此事件发生在自己的航空公司为由屏蔽所有的声讨。虽然至今为止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似乎还未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但是无形中我们似乎都参与了外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一种相处方式的调整。

面对新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如何去构建一套新的体系。而这需要我们以冷静的态度去面对。正是马航事件揭露了现今国际社会的格局：灾难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境内的问题。随着人员来往的日益频密，各国之间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也加重，而通过有效沟通来解决问题亦成为了关键。在这其中，也出现了一国政府不再只是向自己的国民负责，而是必须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人士的沟通。

这也许好，但也有不好的成分，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是如何得到这种反思的。

我们在感到愤怒和惋惜之余，悲剧更是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理性地面对生命的脆弱。谁又能如此有自信地站在道德高处之上，疯狂地提出指责？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有一些网民开始攻击马来西亚人，在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的微博里恶意留言，重伤无辜的歌手。

我们必须反复地强调。理性爱国的才算是爱国，否则的话只会更会有损国誉。在网上看到了中国日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理性地对待 MH370 惨剧”的文章，就围绕着理性看待事件作为主题。文中呼吁：“China is a highly civilized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fully capable of maintaining order and making objective and rational decisions. The rest of society should likewise take a rational attitude.”

马航事件应该是航空史上最特殊的事件之一。当我们以为一切万无一失的时候，突发的事件除了考验我们应对的能力，更考验我们的理性。或许我们会指责马来西亚当局应对能力的不足之处，但是理性还是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理性绝对不是冷酷无情的一种变相说法，而是在合理的范围提出自己的意见，拒绝过于偏激的语言和方式。只有这样，我们的意见才能够被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对起着正面的效应和意义。

我们将永远记着马航的死难者，我们也将永远记着特殊事件所给予我们的深刻的反省和教训。当不同国家的人因为科技的发展和其他不同的因素而拉近了联系，我们也必须思考如何去应对跨越国界的事件和问题。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字还是理性。

春天到了，花也开好了。一出悲剧也在我停笔之时也落下了帷幕。停下脚步，重拾，只能够继续向前吧。

从中国文物流失问题看文化软实力

边旭 国际关系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2013 年 12 月，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黄怒波向挪威卑尔根 KODE 博物馆捐资 1000 万挪威克朗（约合 160 万美元）。作为回报，该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石柱将于 2014 年 9 月被送回中国，并于黄怒波的母校北京大学展出。

此事一经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我国文物流失问题的关注。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创造出无数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然而由于战争劫掠、盗窃走私、非法贸易等原因，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到世界各地，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文物流失问题会对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造成怎样的消极影响？并提出对此问题切实的解决方法。



文物流失定义及主要回归渠道

所谓文物流失，根据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提出的说法，即指：“1840 年鸦片战争后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的一百余年间，因战争被劫掠的、或因盗掘、盗窃、不正当贸易等非法方式流散到国外的文物。”该定义有一定合理性，但笔者认为把流失文物的时间界定在 1840 年到 1949 年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诚然，这一百余年是流失文物最为猖獗的时期，但是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存在着盗窃、走私文物的现象，且数量不在少数，所以笔者认为文物流失时间上的界定可以更为宽泛一些。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明清时期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大势，导致在清末遭遇外敌侵略。西方国家秉持着自古罗马征服古希腊时期以来的传统战争观，普遍认为战败国的所有财产，包括人和物都属于战胜国，故在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中，欧美列强作为战胜国掠夺代表战败国民族身份和国家形象的文化财产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国的流失文物主要集中在欧美和日本，总数超过 1000 万件¹，美国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等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藏品数量多，质量高，由此使美国成为收藏中国艺术品最主要的国家。此外，英国、法国、日本也藏有大量中国文物。

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人民要求归还珍贵文物的呼声越来越高，

1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1 年统计：在 47 个国家 218 个博物馆中藏有中国文物 167 万件，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约是馆藏文物的 10 倍，故总数可达 1000 万件。

政府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于 2002 年 10 月设立了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并于 2003 年 7 月启动了“国宝工程”，其宗旨是协助政府，动员社会力量，联合国内外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促成海外流失国宝早日回到祖国。从近几年的回归案例来看，目前几种常见的回归渠道是：

1，回赠

指个人或企业将自己收藏或购买的珍贵文物捐赠给国家或国内文博机构永久收藏，比如开篇提到的黄怒波先生的行为即属此类。国家为鼓励个人捐赠行为出台了不少政策与法规，如 2002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中的第七条、2002 年 10 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企业等社会力量向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等等。

2，回购

即政府出资购买流失文物。这是一种比较便捷的回归途径，但一方面被拍卖的文物大多为私人藏品，各大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极少拿出来拍卖，所以通过拍卖只能回购到少量文物。另一方面文物价格一路飙升，政府没有能力购回全部流失文物，因以上两点原因回购不是流失文物最理想的回归方式。

3，追索

即政府及有关部门向收藏流失文物的国外博物馆等收藏机构表明正义讨还的坚定立场，力争通过相互理解、平等对话、文化交流、国际合作等方式促成文物回归。如 2008 年 10 月法国佳士得公司悍然拍卖圆明园兔首鼠首铜像，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并严正声明将继续依照相关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法规，采取一切必要途径追索历史上非法流失的文物。

文物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指的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军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相比同等重要。他指出：“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大众传媒等方面，软实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的”²。

文物作为一国历史发展的产物，深深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任何文物，都是根据产生它的年代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水平所创造出来的，本身包含并且反映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所以从整体来看，文物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一身的历史遗存。三者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存在于文物之中，相互渗透，相互制约。

文物作用的大小是由文物价值的高低决定的，文物的作用主要有史料作用、借鉴作用、教育

² 约瑟夫·奈：《软实力》 1990 年 第 156 页

作用。教育作用指的是文物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科普教育的形象生动的教材，文物的教育功能在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进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文物作为教材，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它的教育手段是其他手段所不能代替的。首先，文物不仅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物质遗存，同时又都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表现。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真实可靠、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以物质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往往比文字的教育收效更大。其次，文物是直观的、形象的物质遗存，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这种直观的感染力和强大的说服力是其他任何教育手段不能代替的。

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文物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遍布全国各地的古建筑、石窟寺、古石刻、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考古发掘出来的或传世的数以万计的文物作为实物见证，使人们直观、形象地感受到中国古老悠久的文明、灿烂辉煌的文化，领悟到中华民族的伟大，进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文物教育还有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用聪明才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蕴含着和体现着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思想感情和共同的心理素质。运用文物对人们进行教育，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成为团结全民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当见到圆明园遗物时，人们常常会回忆起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由此可以激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积极进取，避免历史的重演，这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此看来，保护珍贵文物、追回流失文物是提升一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在追索流失文物上仍存在一些困难亟待解决。

我国追索流失文物所面临的法律障碍

尽管我国已经加入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所有国际公约，理论上来说这些公约对保护我国文化遗产、打击文物盗窃走私、追索非法流失文物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文物流失现象反倒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为代表的文物保护公约中的一些条款仍存在一些缺陷，给我国追索流失文物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法律障碍：

1，国际公约不具追溯力，这是我国追索流失文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1954 年的海牙公约和 1970 年的 UNESCO 公约都未对公约的追溯力进行明确规定，因此对公约生效前流失的文物没有约束力。而 1995 年的 UNIDROIT 公约第十条也明确说明该公约仅适用于对一国生效后在该国提出索还请求的被盗文物和在本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从该国领土内被盗的和非法出口的文物，故一国在公约生效前流失的文物不能据此要求返还。对我国而言，因战争流失的海外文物大都在这些公约生效之前，中国政府在签订公约时声明保留追索历史上被掠夺或通过其他非法途径流失的文物的权利，尽管国际社会也公认“战争中被非法掠夺的文物必须物归原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于 1995

年提出一项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时间限制³。可惜这些原则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只能起到道德规范作用，文物市场国对该类原则普遍没有明确表态，国际条约调和不同国家间矛盾的效力始终非常有限，若要将此原则真正条文化、规范化，恐怕还有很长一段道路要走。

2, 公约缔约国不具备广泛代表性导致公约效力大打折扣。目前公约缔约国主要为像中国这样的文物出口大国，像日本、英国等拥有大量非法流入文物的国家因公约对文化财产定义过于模糊等种种原因拒绝签署。追索对象国的有限导致我国追溯文物的行动大受限制。

3, 我国国内法制建设上的不足也使追索工作步履维艰。虽然 2002 年通过的《中国文物保护法》对 1982 年的相关法律中的一些缺陷做了一些修订，如“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些文物均归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不因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⁴新文物法还完善了文物出入境管理制度及相关核查程序，有利于守住文物非法流转出境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新文物法的法律条文过于原则化、简单化，亟待实施细则的进一步出台，而且中国加入的海牙公约、UNESCO 公约等公约在新文物法中没有任何体现，我国政府相关部门也始终未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追索工作。

4, 追索文物的诉讼程序本身存在耗时长，费用高的问题，使许多试图申请的国家望而却步。追索文物的诉讼程序涉及许多有待判定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包括流失文物的来源地和原所有权的证明、请求国文物法及进出口法的审查、证据的选择与核查等等。程序上包括广泛全面的证据收集与认定、相关文物资料的获取，请求国与被请求国相关法律的查明、复杂的民事与刑事诉讼程序等等⁵。因此，依据法律手段追索文物往往历时数年，耗费双方巨大的人力物力。高昂的诉讼费用、复杂的诉讼程序往往使经济实力有限的请求国不堪重负。

总之，试图将我国流失文物问题纳入国际法律框架，依法追索的成功案例虽有，但数量极为有限。下面举出的两个例子或许对解决我国文物追索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际成功案例对我国的启示

盖蒂博物馆归还意大利流失文物

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意大利同样遭受文物流失的威胁，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文物盗窃走私活动，意大利政府于 1969 年成立文化遗产防护指挥部，专门负责监控文物安全状况，同时还与英、法等国签署共同打击文物犯罪的协议，以跨国合作的方式追讨流失境外的文物。

对意大利文物的主要流入国——美国，意大利政府于 2002 年与其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打击文物盗窃走私行为。此外，意大利文化遗产部还通过联合展出、长期租赁和共同发掘等合作方式与美国部分博物馆达成协议，为其提供所需陈列的同等价值艺术品，并允许美国专家学者参与意

2, 阮振宇：《流失文物追索国际公约与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困境评析》，《文物世界》，2001 年。

3, 2002 年《中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

4, 阮振宇：《流失文物追索国际公约与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困境评析》 文物世界 2001 年

大利的考古发掘项目，以换取对方同意归还走私文物。

2005年，在意大利文物宪兵掌握了1995年美国盖蒂博物馆非法购买一批意大利文物的证据后，意大利政府以合谋走私和窝藏文物罪对其前馆长马里恩·图尔提出指控，并与盖蒂博物馆就文物归还事宜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谈判。2006年，意大利政府加大外交干预力度，规定如果盖蒂博物馆于当年7月不归还所要求的所有文物，将中断与博物馆的所有合作。在经过新一轮的艰苦谈判后，2007年8月1日，意大利文化部和美国盖蒂博物馆发表联合共同声明，博物馆同意将原属意大利的40件文物全部归还意大利，作为交换，意大利政府撤销对博物馆的司法指控。其签署的双边协议基本解决了双方对于文物归属的长期争端，双方同意互借艺术品、联合展览以及共同研究。在追索流失文物的道路上，意大利政府锲而不舍、态度坚定。

耶鲁大学归还马丘比丘文物

1911年，美国地理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海勒姆·宾厄姆在秘鲁境内发现马丘比丘遗址，发掘出4000余件研究价值极高的珍贵文物，当时秘鲁的统治者同意宾厄姆将这批文物运出境外，但必须在一年后及时归还，但是而后这一期限被拖了将近一个世纪。

秘鲁从1917年开始频繁发函至耶鲁大学，要求归还文物，但迟迟没收到回复，最终在2007年9月15日，秘鲁住房和建设部部长埃尔南·加里多·莱卡宣布秘鲁政府已与耶鲁大学达成协议，后者同意将收藏的4000余件文物归还秘鲁，耶鲁大学将派出专员担任秘鲁政府的顾问，在马丘比丘印加城堡附近的库斯科市兴建一座新博物馆，收藏和展出归还的4000余件印加文物。

结语：

文物是一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展示国家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而且能够激励起本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人们奋发进取。但是，因战争劫掠、盗窃走私等引发的文物流失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尽管相关国际公约在解决流失文物问题方面发挥了一定正面作用，但毕竟作用有限。我国政府近些年来逐渐重视该问题，主张采取法律途径加以解决。我们还可以考虑借鉴相关国家的经验，采取平等对话、友好协商、馆际互借等途径，甚至可以考虑施加一定的政治压力来解决问题。随着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对文物流失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的深入，相信在未来曲折的文物追索之路终将变成康庄大道。

丝绸之路经济带，没那么简单

鲁蕾 国际关系学院 11 级本科生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对中亚国家进行了访问，提出了构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以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全面合作。中国准备利用自身雄厚的资金优势，建立从太平洋到欧洲、首先囊括中亚、南亚和外高加索所有国家的“经济带”。正如中国官方所言，这一举措可以帮助实现经济带上各国发展的互利与共赢：一方面，这些国家将成为中国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服务与物流的受益方，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借此带动西部的开发，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然而，这一“宏韬伟略”的提出仅仅是因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吗？结合近期国际市场上的种种不平静，我们可以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背后的原因没那么简单。



新的多边贸易机制，中国出局？

近年来，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机制的建立如火如荼。目前以美国为主的一些国家正在力推三项多边协调机制，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简称 TTIP），以及 PSA（Plurilateral Services Agreement, 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可以看出其覆盖的范围和影响力之大，足以对 WTO 的多边贸易体系造成挑战。不难看出，这些机制将中国排除在外，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国的发展空间。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前身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APEC）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等四国发起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目前 TPP 共有 12 个成员国（谈判国），这 12 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比重约 40%。

TPP 涵括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安全标准、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竞争政策、政府补贴、反贪、限制国有企业、海关合作等内容，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远超过一般自由贸易区协议。



2013年6月，美欧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简称TTIP）的谈判。TTIP的谈判规格非常高，一旦谈判达成，美欧将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方面制定新的规则，这对想进入美欧市场的企业来说无疑提高了“门槛”。TPP和TTIP囊括了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众多新兴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也超过全球总量一半以上。

在WTO的规则中，全球各国服务业贸易规则实际处于空白状态。2013年1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署通知美国国会，将联合包括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香港、以色列、日本、墨西哥、新西兰、智利、挪威、秘鲁、韩国、瑞士、台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拿马、冰岛共21个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启动“诸边服务业协议”谈判，这是在全球国际化的国与国“服务业”领域，开辟的第一条国际通道。

可以看到，这三项新机制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而且标准已经严重大大超过了中国的可接受范围。另外，中国的经济目前是以制造业为支柱的，产业升级的方向是成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双支柱的经济体。美国想把中国排除在三个全球性的服务业贸易协定的谈判之外。一旦得逞，中国服务业的外需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无疑会严重阻碍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总的来说，美国的这一系列举措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将被排除在这个新的游戏框架之外，中国面临“出局”的危险。

“冲击——反应”：中国的应对

为了拓展国家发展空间，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首先，从内部发展来看，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减少行政对经济发展的干预。通过内部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不仅能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而且有助于为改善外部环境创造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并明确提出了各项改革的步骤；此外，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将大大加快中国的开放程度。

然而，中国能否真正打破外部封锁的根本点取决于能否真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目前中国并未进入到创新国家行列，反而因为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正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中。在这一前提条件下，目前本轮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以及中国的反封锁，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中国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资源、市场、政策等巨大代价，争取到了一些同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锁死中国的计划。然后中美两国重新进行沟通，在中国进一步放松对意识形态、国有企业、国内市场等控制，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之后，双方再次找到合作的基础，从而开始一段新的合作进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只有以一个更高端的产业结构为基础，才能整合外部资源，从而在国际经济贸易变革当中真正把握战略主动权。



其次，从外部因素来看，中国的外交更加主动，正努力构筑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新格局。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实际上是美国、欧洲、俄罗斯、中亚、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国家、非洲、新兴市场国家等主要利益主体之间角力的结果。除中国外，还有很多国家也被排除在这三项体制之外，中国可以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以拓展自己的战略发展空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则是这一环境背景下的战略对策。

丝绸之路经济带，没那么简单

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向西拓展中国和中亚之间的经济合作。中亚国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良好，但近期经济增长的势头有所减弱，并且中亚也被排除在上述的三大贸易机制之外，因此，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机会。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交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俄的合作提供了条件。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也符合近年来中国的“西进战略”。中亚地区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很难由一个国家单独主导，美、俄、中各方势力相对平衡，同时这个地区也是大国博弈中风险相对较低的地区，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有利于改善中国在欧亚地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格局。

此外，有专家评论称，陆上“丝绸之路”想法的出现，与中国领导层对上合组织的无效和“行动迟缓”感到不满有着直接的关系。利用这个经济纽带，可以提升中国对中亚地区国家的影响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念是创建中华强国战略中的一部分，是对两千年前铺设“丝绸之路”的古代中华文明强盛态势的某种历史性复兴。其背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经济内涵。但是众所周知，在动听的口号和其实际落实之间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范围广，怎样平衡布局，协调好国内各部门的分工仍然需要更为详细的探讨与论证。此外，中国也不能忽视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的态度，区域合作应该是双方的共同需求而非一厢情愿，中国应避免陷入“新霸权主义”的质疑之中。

“丝绸之路”路漫漫，中国能否顺利克服其中的困难，承担起这个经济带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社会代价，还要看区域合作能否有效展开、国内改革的决心与进程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博弈能否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进行。

中國流行音樂中的民族化現象

——以音樂形態中的民族特色為核心

王天白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2011 級本科生

流行音樂是根據英語 Popular Music 翻譯過來的，也曾被譯為“通俗音樂”，是一種音樂體裁的名稱。對於流行音樂的界定有着大量的論述⁶。普遍認為，流行音樂的特點包括通俗易懂、輕鬆活潑、易于流傳、擁有廣大聽眾等⁷，有別於民間音樂和藝術音樂。

近年來，流行音樂民族化趨勢愈發顯著。普遍認為，流行音樂民族化包括如下幾個層面：（1）在音樂形態中體現民族特色，如在配器中使用民族民間特色樂器，在演唱中加入傳統唱法等；（2）在音樂內涵中凸顯民族意蘊，如在歌詞創作過程中融合民族元素，在音樂表達中體現民族情懷；（3）在音樂行為中創新民族作品，如使用流行音樂形態對民族民間音樂進行改編與表達。在實際的音樂創作中，音樂人常會將不同的層面進行結合。

由於流行音樂民族化這一問題所涉及的時間段相對較長、領域相對較廣、作品相對較多，本文難以對該問題的各個層面進行展開論述。作為一項探索式研究，筆者擬以前文所述的首個層面，即“音樂形態中的民族特色”為出發點，對近年來流行音樂民族化的趨勢、作品與成就進行梳理，並對其特點與發展前景進行分析。

一、流行音樂民族化的進程

從廣義上講，“流行音樂”作為外來概念被中國所接受並在中國進行發展傳播的過程，便是中國流行音樂民族化的進程。因此，流行音樂民族化的發端可以上溯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黎錦輝、陳歌辛等音樂家的創作開啟了中國流行音樂民族化的先河。在本文的討論範疇中，流行音樂民族化的概念趨向於狹義角度，即以中國民族民間特色在音樂形態中得到較為明顯的體現作為判斷流行音樂民族化的標準。因此，“西北風”成為中國流行音樂民族化的重要里程碑。自“西北風”開始，中國流行音樂民族化的進程全面開啟，歷經二十餘年的發展，形成了“百花齊放”的盛大場面。

⁶ 參見陶辛主編：《流行音樂手冊》，上海音樂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 頁。

⁷ 參見田可文編著：《簡明中國音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9 頁。

1、“西北风”

“西北风”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中极为重要的现象。这一概念“来自《黄土高坡》中的词句‘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指的是当时风行全国的北方民歌风的流行歌曲热”⁸。

普遍认为，“西北风”歌曲的发端是1986年由刘志文作词、解承强作曲的歌曲《信天游》。《信天游》由王斯首唱，又由程琳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标志着“西北风”的兴盛。此后，《我热恋的故乡》（广征词，徐沛东曲）、《心中的太阳》（李文歧词，李黎夫曲）等一大批歌曲相继被创作出来，特别是陈哲作词、苏越作曲的《黄土高坡》，一举成为“西北风”歌曲中的扛鼎之作。1988年，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片中的三首歌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颠轿歌》与影片一起以强烈的乡土气息风靡全国。

自此，“西北风”被推向了最高潮。在1988年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通俗唱法专业组的金、银、铜奖六位选手演唱的十二首作品中，有六首为“西北风”作品⁹，歌手杭天琪以《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两首作品获得银奖。而在业余组中，“西北风”作品在六位获奖选手演唱的十二首作品中也占据了五席。

“西北风”歌曲的主要特点包括：以真声为主的嘶喊式表演模式；运用鲜明的北方音调和北方乐器和编曲方式；歌曲内容中体现的人文精神与家国意识¹⁰。这些特点与当时文化界普遍兴起的“寻根”热潮¹¹和群众审美取向的转变密不可分。经历了港台流行音乐的传入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内地流行音乐对其进行模仿式创作后，“西北风”歌曲满足了当时的社会审美期待，再辅以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宣传，催生了一大批优秀歌曲，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歌手，使得“西北风”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大陆流行音乐开始摆脱了被动模仿的阶段而开始渐渐走向成熟”¹²。出于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红极一时的“西北风”歌曲自1988年起日渐衰落，但其在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过程中的开辟性作用无法被忽视。

2、朱哲琴与“新时代音乐”

“新时代音乐”不刻意强调旋律的优美和节奏的动感，而是更加注重音色的奇异多变和织体的细腻丰富，注重整体气氛的营造。早期的“新时代”以电子乐器和高技术的录音手段为特色，

⁸ 参见陶辛主编：《流行音乐手册》，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89页。

⁹ 此外，获得铜奖（第四名）的歌手胡月演唱的《玛露情歌》（徐演词，晓耕、万里曲）也是一首流行音乐民族化的作品，获得金奖的歌手陈汝佳演唱的《故园之恋》（李川、亦尘词，付林曲）中的“引子”部分亦带有流行音乐民族化的色彩。

¹⁰ 参见付林：《中国流行音乐2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¹¹ 自1985年起，中国文学艺术界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创作根基，推出了一大批根植传统文化，带有民族色彩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

¹² 金兆钧：《光天化日之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后来又加入了各种音色奇特的民族乐器和多种音乐元素¹³。朱哲琴、何训田作为中国“新时代音乐”的代表人物，通过《黄孩子》、《阿姐鼓》、《央金玛》三张专辑在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卓著的作用。如果“西北风”标志着中国的流行音乐走向成熟，朱哲琴和她的专辑则代表着中国的流行音乐走向世界。

1990年，朱哲琴曾以《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第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银奖。在获奖两年后，朱哲琴与何训田合作推出专辑《黄孩子》（何训友词，何训田曲），标志着二人进行音乐合作的开始。专辑主打歌曲《黄孩子》、曲目《吹箫人》等作品中均使用了民族乐器，特别是《大海走了》中使用了笛、箫等乐器烘托朱哲琴的演唱，对于营造歌曲的整体气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黄孩子》在发行初期的反响虽然不及朱哲琴其后的几张专辑，但标志着她在“新时代”音乐领域上的起步，并奠定了朱哲琴、何训田的合作基础。专辑推出后，朱哲琴被称为“东方的恩雅¹⁴”。

1995年，朱哲琴、何训田的《阿姐鼓》成为国际唱片史上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国唱片，推出后赢得大量国际赞誉¹⁵。在专辑录制过程中，朱哲琴的演唱未经剪辑混音，而何训田在录音时运用电子合成器的方式进行收录，最终却打造出了该张专辑中浓郁的民族特色。唱片同名歌曲《阿姐鼓》（何训友、何训田词，何训田曲）成为亚洲流行音乐的代表。《阿姐鼓》“用西洋大小调的作曲技巧，以中国民族乐器鼓为主要伴奏乐器”¹⁶，融汇了流行与民族的音乐之美。歌曲将佛教徒的诵经声音融入背景音乐，并使用鼓声伴奏，其包含的西藏文化的神秘主义色彩极大地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与表现力。专辑中的其它作品如《天唱》（何训友词，何训田曲）、《卓玛的卓玛》（何训友词，何训田曲）等均有着较强的民族特色，《羚羊过山岗》（陆忆敏词，何训田曲）更是通过生动的歌词、悠远的和声、流畅的拖音和丰富的配器营造出宽阔的音场和分明的层次。由于《阿姐鼓》专辑中采取的高保真（High-Fidelity）¹⁷的制作理念让音响的各个部分都清晰明透，这一专辑已经成为了考验器材的标杆。

1997年，朱哲琴、何训田再度联手，推出专辑《央金玛》。这张唱片在世界65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再一次引发了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热潮。朱哲琴在评价自己的专辑时说到：“《阿姐鼓》像是从天上看西藏，《央金玛》则是直接进入西藏。”《拉萨谣》（何训田、张鲁词，何训田曲）中，朱哲琴与藏族歌手的合唱体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大的震撼力。《七只鼓》（何训田词曲）中逐渐局促的鼓声引出朱哲琴极具爆发力的唱腔，强烈的反差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六世达赖喇嘛情歌》（仓央嘉措词，何训田曲）则将“声场”的概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2004年，朱哲琴发行精选集《最动听的朱哲琴》。2008年的专辑《七日谈》则是朱哲琴、何

¹³ 参见陶辛主编：《流行音乐手册》，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页。

¹⁴ 恩雅（Enya），爱尔兰著名音乐家，“新时代音乐”的代表人物。恩雅是现在全球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累计销量已逾一亿张。

¹⁵ 《阿姐鼓》荣获英国《Q》杂志全年度“五张最佳 World Music 唱片之一”、美国录音协会“经典唱片奖”、新加坡电台“醉心金曲奖”、台湾金鼎奖“全年度最佳专辑奖”等多项奖项。

¹⁶ 薛莲：《何训田〈阿姐鼓〉的分析和演唱研究》，载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¹⁷ 缩写为 Hi-Fi，指声频录音及放音系统或设备具有如实反映声音信号本来面貌的能力，以及设备对声音信号进行特定修饰、加工处理和声场再现时声像位置及其移动的逼真程度。

训田由“新时代音乐”向“世界音乐”的转型之作。2009年，朱哲琴发起“世界听见”活动，赴贵州、云南、内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采风。朱哲琴、何训田的音乐风格影响了其后一大批音乐人的演唱与创作，标志着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一个高峰。

3、李娜与《苏武牧羊》

在介绍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进程中，李娜的地位不容忽视。她在十年间为160部电视剧配唱了200余部主题曲，《苦篱笆》（张黎词，徐沛东曲）、《嫂子颂》（裘逸词，张千一曲）等作品流传一时。李娜首唱的《走进拉萨》（张千一词曲）、《青藏高原》（张千一词曲）等歌曲将藏歌元素融入中国流行音乐中，成为继朱哲琴之后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又一系列代表作品，并影响了其后长时间内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导向。对于藏族民歌元素的问题，本文将在下一节中进行探讨。

在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进程中，一张不能忽视的专辑便是李娜的《苏武牧羊》（田青词，黄荟曲）。1997年推出的《苏武牧羊》专辑以乐歌《苏武牧羊》（蒋荫棠词¹⁸，田锡侯曲）为贯穿旋律，融入古代雅乐、燕乐、西北民间音乐、蒙古族音乐及中亚、阿拉伯、东欧音乐的风格，并辅之以电声与乐队，实现了严肃音乐的通俗化。1998年，该专辑荣获全国首届优秀文艺音像制品一等奖的第一名。

以套曲中的第六首《酒歌·归来》为例，歌曲中运用了大量的民族乐器，如琵琶、阮、古筝、古琴、笙、排鼓、镲等以营造苏武归来的喜悦与急切之情。不同乐器之间的相互转换不仅烘托了演唱者的情感，还为歌曲本身划分了层次，增强了歌曲的表现力。如在“黄河万里归大海，一头扑进母亲的怀”一句中使用唢呐独奏，将歌曲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地，在歌曲即将结束时，音乐全部短暂收起，进而通过民族管乐的齐奏引出了李娜的真声高音¹⁹，把整首歌曲拉向最高潮。为了体现音乐形态中的民族特色，《苏武牧羊》专辑中的多种乐器都是仿照古乐器复制，极大地增强了流行音乐中的民族色彩。当然，该张专辑中对于和声的运用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这里限于篇幅原因不展开论述。

在《苏武牧羊》推出后不久，李娜便遁入佛门，《苏武牧羊》也就此成为了李娜在中国流行音乐界的收官之作。诚然，由于该张专辑七段一体的套曲结构，歌曲本身所需要的歌手的极强的表现力以及原唱李娜的高超的演唱技巧，《苏武牧羊》中的歌曲至今未被其他歌手进行翻唱，流行程也相对有限。但专辑中的七首作品对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失为近年来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巅峰作品之一。

4、少数民族元素与中国流行音乐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中更多地吸收了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推出了

¹⁸ 一说词作者为翁曾坤。

¹⁹ 该曲中李娜的真声高音包含了混声部分，发声位置相对靠上，但与藏歌中的高音不同，真声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

一大批有着浓郁民族色彩的流行音乐，受到国内听众的喜爱，甚至登上了国际舞台。

（1）藏族元素

除上文已经提到的朱哲琴、何训田及其系列专辑外，藏族元素在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过程中占据了显著地位，大量融合了藏族元素的流行歌曲作品脱颖而出，以其高亢的唱腔、辽阔的音乐、特色的编曲吸引了大量听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是《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由张千一担纲词曲创作，1993年由李娜首唱，随后被多位歌手翻唱或作为比赛曲目。《青藏高原》将流行歌曲演唱风格与藏族民间演唱风格结合，实现了音乐形态上的创新。歌曲的引子即使用藏族山歌的衬腔，而副歌部分更是通过运用长调的表现手法，增强了作品艺术性的同时，也使得其地域特点更加鲜明，凸显了作品的民族性。这首歌曲并且突破了流行歌曲与艺术歌曲的严格界限，在中国家喻户晓，成为了藏歌元素与中国流行歌曲相结合的代表作，在全国掀起了一次藏族歌曲演唱的高潮。

此外，结合了藏族元素的中国流行歌曲还包括《走进西藏》（张千一词曲）、《回到拉萨》（郑钧词曲）、《唐古拉》（陈虹词，羊鸣曲）、《在那东山顶上》（仓央嘉措词，张千一曲）、《高原红》（陈小奇词曲）、《神奇的九寨》（杨国庆词，容中尔甲曲）、《雅鲁藏布大峡谷》（何训友词曲）、《卓玛》（李众词，孟庆云曲）、《坐上火车去拉萨》（何沐阳词曲）、《遇上你是我的缘》（昂旺文章词，才仁巴桑曲）等。值得一提的是，郑钧于1994年推出的《回到拉萨》将西藏元素与摇滚曲风进行结合，并使用藏族山歌作为和声，不仅开启了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新形式，也对中国的摇滚音乐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²⁰。

就歌手而言，韩红于1998年以专辑《雪域光芒》崭露头角，专辑中的《家乡》（韩红词曲）融合了鲜明的藏族元素，推出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第二张专辑《醒了》中，韩红翻唱了经典曲目《青藏高原》，并演唱了《穿行》（韩红词曲）等曲目。需要指出的是，从韩红所演唱的作品来看，其对于西藏元素的运用更多地集中在表意层面即歌词中，曲风则更多地使用现代流行元素。这一类流行歌曲在音乐形态上并没有实现民族化，限于篇幅，本文不展开进行论述。此外，容中尔甲、亚东、美朗多吉、央金兰泽、降央卓玛、高原红组合、高原风组合等藏族歌手或组合也通过自己富有藏族特色的流行音乐作品得到了听众的喜爱。略显遗憾的是，这些歌手和歌曲创作主要集中在青海、四川等藏区，而西藏歌手的数量则相对较少。

（2）蒙古族元素

与藏族元素同期或稍晚些时候，蒙古元素也被更多地吸收到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创作过程中来。这一类作品旋律悠扬、节奏明快，部分歌曲引入了蒙古民歌中传统的呼麦、长调等唱法，使用了蒙古族的传统乐器马头琴等元素。

对于蒙古元素在中国流行音乐中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至1986年的《蒙古人》（腾格尔词曲）。

²⁰ 歌曲《回到拉萨》所属的专辑《赤裸裸》是郑钧的首张专辑，十首歌曲全部由郑钧独自作词、作曲并演唱，被列为中国摇滚史上的经典唱片。

腾格尔以该首歌曲在 1989 年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上获第一名。《蒙古人》融汇了蒙古元素和摇滚风格²¹，在当时的音乐背景下可谓是一次重要的试验与突破。1997 年，腾格尔推出了又一代表作《天堂》（腾格尔词曲），奠定了他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天堂》的曲式以蒙古长调民歌作为依托，歌词则从《牧歌》中化来。在配器方面，以电子音乐作为前奏，穿插入马头琴、蒙古族大鼓等多种民族乐器，营造出草原辽远宽阔的意境。《天堂》荣获第六届中国原创歌曲金奖。

成功将蒙古元素与流行音乐结合的作品还包括《大地》（屈塬词，文子曲）、《鸿雁》（吕燕卫词，曲改编自蒙古族民歌）、《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杨艳蕾曲，斯琴朝克图曲）、《吉祥三宝》（王宝、布仁巴雅尔词，布仁巴雅尔曲）、《月亮之上》（何沐阳词曲）、《套马杆》（刘新圈词，郭永利曲）等。这些歌曲中均带有浓郁的蒙古元素，部分歌曲甚至使用了蒙语进行演唱或和声。其中，《大地》、《鸿雁》被选为青年歌手大奖赛选手参赛曲目，《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吉祥三宝》、《月亮之上》都登上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套马杆》则荣获“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殊荣。值得一提的是颠覆 M 乐队于 2008 年推出的专辑《蒙古精神》（颠覆 M 乐队词曲），将民族元素与金属元素融合。在专辑同名歌曲《蒙古精神》中，呼麦的运用展示了蒙古元素在金属音乐中所发挥的可能性。

蒙古元素流行歌曲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歌手与乐队，除上文提及的腾格尔外，布仁巴雅尔、哈琳、呼斯楞、乌兰托娅、玉萨等歌手，额尔古纳乐队、蓝野乐队、凤凰传奇等组合²²，均因演唱蒙古元素流行歌曲得到了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特别地，凤凰传奇藉由蒙古民族音乐、流行音乐和说唱音乐相结合的《月亮之上》一举成名，并以该类型风格音乐为主推出了一系列专辑，其演唱的《最炫民族风》（张超词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影响。

（3）其它少数民族元素

除藏族元素、蒙古族元素外，其它少数民族元素在中国流行音乐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运用。《楼兰姑娘》（杨海潮、付林词，付林曲）《寂寞公路》（羽泉词曲）、《喀什噶尔胡杨》（刀郎词曲）、《咚巴拉》（陈涛词，张宏光曲）等歌曲融汇了新疆元素，《火火的歌谣》（张全复词曲）、《让我们回去吧》（吉狄马加词，奥杰阿格曲）、《带我到山顶》（奥杰阿格词，吉克曲布曲）等歌曲中体现了彝族特色，《画出我世界》（唐恬、尚雯婕词，尚雯婕曲）使用了侗族大歌作为和声，由李琼演唱的《山路十八弯》（佟文西词，王原平、尹建平、李琼等曲）带有浓郁的土家民族特色。以《高原女人》（蒋明初词，万里曲）、《彩云之南》（何沐阳词曲）、《蝴蝶泉边》（彭青词曲）为代表的流行歌曲中结合了云南的音乐元素，而《苗家六月》（杨长文、龙步云词，郑建安曲）、《山妹子》（徐建模词曲）等歌曲则加入了贵州的音乐元素。

²¹ 对于腾格尔是否属于摇滚歌手这一问题，存在着一定的争论。腾格尔曾被票选为“中国三大摇滚歌手”之一，与王迪、崔健齐名。1993 年，腾格尔还曾组建“苍狼”乐队。

²²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支组合均参加了 2005 年的“星光大道”栏目，并分别获得月冠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蒙古元素流行音乐的热潮。

虽然融合了少数民族元素的流行音乐作品在中国流行音乐中并未占据主要地位，但其独特性依然为其在市场和舞台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为了更好地推动此类作品的创作与推广，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方政府与媒体通过歌曲征集、举办比赛等方式，催生了一大批民族性、地域性鲜明，艺术性较高的流行音乐作品，为中国流行音乐“百花齐放”的状况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5、萨顶顶与“世界音乐”

继朱哲琴之后，萨顶顶成为新时期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其2007年发行的《万物生》专辑带有浓郁的“世界音乐”特点，既继承了朱哲琴“新时代音乐”的创作特点，又凸显了自身的特色。该专辑荣获英国BBC世界音乐大奖。专辑同名歌曲《万物生》（高晓松词，萨顶顶曲）为萨顶顶的代表作，将西藏民间音乐、中国民族乐器、梵语念白等元素融入西方电子曲风中，加上萨顶顶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朴素的演绎方式，使得这首作品成为“世界音乐”的代表。萨顶顶与上文所述的朱哲琴有着不同的音乐风格，相较朱哲琴，萨顶顶音乐中的电子元素更为明显，其多首作品在音乐形态上均表现为民族元素和电子音乐的结合²³。

在通过专辑《万物生》阐述人与宗教的关系后，萨顶顶于2010年发行了专辑《天地合》，以此表达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这一专辑中的音乐主要运用了云南少数民族元素与电子乐结合的曲风，萨顶顶用中文、彝文、梵文、英文和“自语”演唱了专辑中的十一首歌曲，其中的《蓝色骏马》（萨顶顶词曲）等作品邀请了来自于彝族、拉祜族等民族的少数民族歌手进行和声。

6、谭晶与民歌手的转型

近年来，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现象还包括了民族唱法歌手向流行音乐的转型，谭晶是这一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代表和最成功的典范。

谭晶曾先后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本科）、解放军艺术学院通俗唱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具有深厚的音乐素养。她是近年来中国音乐界少有的跨界歌手。1998年，谭晶参加哈萨克斯坦国际“亚洲之声”流行音乐大赛，以作品《唐古拉》夺得银奖。2000年，在第九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决赛中，她演绎蒙古族风格的《大地》，一举夺魁。此后，她运用独特的跨界唱法演唱了大量民族特色浓郁的中国流行音乐，如《在那东山顶上》、《远情》（易茗词，赵季平曲）、《桃花谣》（贺东久、李峰词，印青曲）、《龙文》（小虫、权芳词，小虫曲）等。

谭晶之后，多位民族唱法出身的歌手尝试了向流行音乐的转型。2005年，王丽达推出专辑《五百里》，在专辑中与古巨基合唱流行歌曲《爱是神话》，并演绎了《五百里》、《我不是卡门》等歌曲，这张主打“无界”概念的专辑打破了唱法之间的界限，展现了民族唱法歌手转向流行音乐的可行性。2009年，祖海推出专辑《梦·蝶变》，翻唱了港台经典流行歌曲《味道》、《是否》、《追梦

²³ 这一特点很大程度上与萨顶顶的音乐经历有关。2000年，萨顶顶（时名周鹏）参加第九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获得银奖。随后以“中国第一电子女声”之称出版专辑《自己美》。这一时期的音乐积淀为萨顶顶之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人》、《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等曲目。2012年，常思思演唱《北京精神》（方文山词，刘原龙曲），将花腔等严肃音乐元素，三弦、京胡、京剧等北京特色音乐元素与吉他、电子乐等流行音乐元素结合，跨界美声、民族、流行、戏曲，可谓是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又一大突破。

7、中国流行音乐中的戏曲元素

戏曲元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又一现象是将戏曲元素融入流行音乐中，创造出一大批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

戏曲元素在流行音乐中的运用可以追溯至1990年，香港歌手周慧敏的《红颜知己》（向雪怀词，朱德荣曲）中使用了京剧唱段作为过门。1992年，陈升与刘佳慧合作了《北京一夜》（One Night in Beijing，陈升、刘佳慧词，陈升曲），成为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结合的完美典范。该曲大量运用了京剧中老生与青衣的唱腔，与流行唱腔不断穿插结合，成就了这首歌曲与众不同的京韵特色。《北京一夜》后被台湾歌手信翻唱，摇滚元素更为明显。

2005年，后弦《古·玩》专辑中的《西厢》（后弦词曲）为R&B风格的编曲，但却使用了大量的东西方乐器，在引子及过门中穿插了黄梅戏的唱腔。同年，陶喆的专辑《太平盛世》中《Susan说》改编自京剧“苏三起解”的流水快板，并运用了京剧唱腔和Rap说唱同时演唱了京剧唱词。2006年，周杰伦推出作品《霍元甲》（方文山词，周杰伦曲），这首中国风的流行节奏歌曲中运用了京剧中的花旦唱腔。2009年，台湾歌手徐佳莹创作歌曲《身骑白马》（徐佳莹词，徐佳莹、苏通达曲），主歌以流行唱法演绎，副歌则使用了台湾地区的传统戏曲——歌仔戏。2010年李玉刚的专辑《新贵妃醉酒》中同名歌曲《新贵妃醉酒》（胡力词曲）也使用了同样的曲式手法，在副歌中则使用了京剧唱腔，该歌曲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采取新概念创作的带有戏曲风格的流行音乐，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对听众有着独特的吸引力。而这一系列的类型音乐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继承、传播与创新，二者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不少“新京剧”²⁴的出现也带动了新时期中国戏曲的发展。

8、流行音乐民族化在今天

近年来，随着中国流行音乐市场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流行音乐思潮的日益转变，流行音乐民族化现象已经成为流行音乐领域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具有民族特色的选手与歌曲层出不穷。第十三届青歌赛第三名香格里拉组合、第八名额尔古纳乐队，第十四届青歌赛第一名阿鲁阿卓、第六名西尔艾力·赛来、第八名金美儿，第十五届青歌赛第五名桑布扎组合等均大量演唱了带有民族元素的流行音乐作品。特别地，在第十四届青歌赛流行唱法决赛上，组委会设置了“改编民歌”环节，

²⁴ “新京剧”指在传统京剧精华的基础上，广泛借鉴、汲取、吸收包括流行音乐在内的多种艺术元素，以便促使其更好地与时代相结合。

参赛选手运用曼陀林手鼓和电吉它为《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配器，为《一只鸟仔》加入了爵士元素，而《掀起你的盖头来》则出现了摇滚演绎，打造了一场流行音乐民族化的盛宴。

除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外，一系列流行音乐电视节目的推出成为了宣传流行音乐的平台。同时，各类音乐选秀节目的播出，也为流行音乐民族化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平台。2006年“超级女声”节目亚军谭维维、2009年“快乐女声”节目季军黄英、2010年“花儿朵朵”节目殿军杨秀措、2011年“花儿朵朵”节目季军和秋香、2013年“中国梦之声”节目季军央吉玛等选手²⁵借这一平台脱颖而出，并演绎了大量带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流行音乐。2012年起，广西卫视推出选秀节目《一声所爱·大地飞歌》，注重演绎带有民族民间特色的歌曲，这一节目以其独树一帜的定位得到关注。2013年，江苏卫视制作音乐真人秀《全能星战》，其中“民歌专场”、“戏曲专场”中也推广了多首融汇民族音乐元素的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功。2014年，《我是歌手》节目中，韩磊演绎了《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天边》、《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流行音乐民族化作品，大受好评。

二、流行音乐民族化的特点

通过对流行音乐民族化进程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流行音乐中的民族化现象有着如下特点：

1、类别多种，形式丰富

中国流行音乐在近年来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发展，集中表现在音乐数量的激增，形式的扩展，受欢迎程度的提高上。流行音乐民族化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我们不难发现，自“西北风”掀起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首个高潮以来，每隔几年便会出现一个流行音乐民族化作品大量涌现的高峰，而最近几年该类型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从类别上来讲，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民族民间音乐形式均尝试与流行音乐的音乐形态相结合，催生了大量富有特色的流行音乐作品。部分作品在其产生的时期尚具有实验性质，但通过长时间的认知与传唱过程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从形式上来讲，民族元素在流行音乐形态中通过唱腔、念白、配器、和声、曲风等多种形式体现出来，各唱法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造就了一批“跨界歌手”甚至“无界歌手”。

当然，我们确实要承认，少部分作品片面追求流行音乐民族化这一结果，导致音乐形态与音乐内涵脱节，民族元素并未在音乐表意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大部分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都做到了形神合一，民族元素较好地服务于音乐内涵，成就了多首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

2、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占据较大比重

²⁵ 事实上，有大量选手在各类音乐选秀节目中演唱过带有民族音乐形态的流行歌曲，难以做出全面的统计。部分选秀节目还会开辟专门的场次进行该类型音乐的展演。

在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进程中，包含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歌曲在全部歌曲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也有着较高的传唱度。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歌唱家、歌手、音乐人和他们的优秀作品受到听众的广泛喜爱。这其中固然有着民族团结的政治色彩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保护与传播等方面的因素，但少数民族音乐元素本身的特点是促使这类作品得以较好的流行的根本原因。

少数民族音乐本身有着浓郁的民族色彩，大多唱腔高亢辽阔，每一民族又有其特有的民族乐器，大部分民族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多种因素融合在一起，使得对于听众而言，少数民族音乐元素有着一定的新鲜感和冲击力。同时，这些民族民间音乐因其长时间的传承也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较高的艺术性。因此，二者的结合相得益彰。流行音乐通过融汇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而少数民族音乐则通过流行音乐为载体得到了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部分优秀的中国流行音乐也正是通过这一路径走向了世界舞台。

3、“中国风”概念产生并得到推广

在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中国风”这一概念，并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普遍认为，“中国风”需要符合“三古三新”²⁶的标准。目前“中国风”类型的歌曲主要涉及的是流行音乐民族化中的音乐内涵层面，其歌词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但大多数作品的曲风仍属于流行音乐范畴，这一类作品不在本文所关注的音乐形态的讨论范围内。例如大量网络歌手创作的“中国风”作品，其本质是古风色彩的歌词与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相结合，或咏古怀旧、或抒怀寄情，但并未在音乐形态上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民族化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音乐人周杰伦和搭档方文山以一系列的作品如《东风破》、《发如雪》、《菊花台》、《青花瓷》（均为方文山词，周杰伦曲）等形神兼具“中国风”特色的歌曲达到了“中国风”歌曲的巅峰，这些歌曲借助周杰伦的专辑、演唱会得到广泛的推广。《青花瓷》、《兰亭序》、《本草纲目》等作品先后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陈宇佐词，王力宏曲）、（王力宏词，王力宏、崔惟楷曲）等作品也带有浓郁的“中国风”色彩。

由于“中国风”的音乐形态尚在发展中，相关定义并不完善，而作品所涉及到的音乐元素又较为复杂，本文在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进程部分并未将其展开叙述。但“中国风”歌曲在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中的重要地位、发挥的作用和今后的发展前景均不能被忽视。

4、民族化进程以配器作为主要形式

相比唱腔、念白、和声等音乐形式，配器形式在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进程中最为常见，这也是该进程中的重要特点之一。

一方面，配器在音乐制作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另一方面，中国民族民间乐器数量较多，且部分乐器较为多见，容易被运用到音乐创作之中。因此我们看到，除上文中提到的大量中国流行

²⁶ 三古即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三新即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

音乐民族化的作品代表外，有一大批作品或多或少地在配器中使用了中国的民族民间传统乐器。古琴、唢呐、箫、竹笛、羌笛、巴乌、笙、扬琴、琵琶、阮、板胡、京胡、大鼓、小鼓、三弦、锣等乐器在中国流行音乐中极为常见。而在表现少数民族音乐元素时，内蒙古的马头琴、新疆的手鼓、西藏的冬不拉等乐器则成为了配器中的首选。

当然，我们并不能一概地把运用了这些乐器中一种或几种的音乐均归为民族化的流行音乐中，而是要根据乐器在配器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来确定。但大量民族民间乐器的使用，其本身就代表着中国流行音乐人对于民族民间乐器的重视和认可。这些乐器的巧妙运用，成为中国流行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5、借助媒体、比赛等外部因素推广

中国流行音乐事业的进步，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发展。数十年来，大众传媒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流行音乐的展示、传播与表达创设了平台。各电视台、电台所开设的音乐栏目，网络上各原创、翻唱音乐网站等，为民间歌手提供了推广的机会，也为优秀的作品提供了传唱的平台。通过网络走红的“网络歌手”中，不乏有一批倡导流行音乐民族化的音乐人代表。

同时，各项音乐类比赛的发展也催生了优秀的歌手与作品。无论是权威的大奖赛、声乐比赛还是商业化为选的选秀节目，均不难见到有选手展示带有民族化特点的流行音乐。部分比赛甚至以中国流行音乐的民族化作为命题，要求参赛选手创作或演绎这一类型的流行音乐。这些外部因素的推广对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进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6、部分作品“墙内开花墙外香”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流行音乐中，“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仍然屡有出现。1995年朱哲琴的《阿姐鼓》、2007年萨顶顶的《万物生》两张代表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的专辑，均是在国外斩获多个奖项，获得大量赞誉后才得到国人关注与重视，受到国内听众喜爱的。由此可见，对于部分民族化的中国流行音乐，中国听众的认知尚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如何在宣传、传播等方面加大力度，促使这些优秀作品在国内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也是音乐人与音乐公司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进程，总结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特点，勾勒出目前中国流行音乐在音乐形态上的民族化的基本状况。我们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中国流行音乐在民族化的进程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部分优秀作品在世界流行音乐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成就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富的文化积淀，多元的音乐种类和中国音乐人创新的音乐精神密切相关。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早在 1994 年，《音像世界》杂志便开辟专栏讨论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问题。有人指出“流行音乐在引入民族风格时应该拓宽思路，以免走入形式化和庸俗化的歧途”，“不应该单纯地把以前的东西照搬过来”²⁷。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也应当是流行歌手和音乐制作人所应思考的问题。

中国流行音乐领域歌曲数量巨大、曲风庞杂、更新迅速，本文难以通过系统、完整的统计与分析精准地描述近年来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具体情况，而在该领域可资借鉴的文献与目录则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仅能通过笔者的积累与有限的资料对于流行音乐民族化中与音乐形态相关的几大重要领域进行简单的论述。限于笔者的音乐知识与音乐视野，部分领域、作品、音乐人并未在本文中涉及，且文中引用的作品也未进行过多涉及乐理等专业层面上的分析。同时，由于篇幅有限，本文难以对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现象的另外两个层面，即音乐内涵和音乐行为进行更为系统的论述。最后，本文作为一项探索型研究，希望可为该领域内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并能够为流行音乐的民族化与国际化做出贡献。

²⁷ 载《音像世界》1994 年第 10 期，“流行歌曲的中国民族风格讨论专栏”。

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

王天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其实并不愿意写下这篇文字，但终究是到了一定要写下的时候。

三年前，我加入新闻中心的团队，担任《经纬》的美术编辑。三年后，我在学生骨干述职大会上，以新闻中心主任的身份盘点这个团队一路走来的足迹。时间转得太快，《经纬》的团队在不停地更替，而我也到了即将离开她的时候。而这一期，她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这一期的经纬，我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文化软实力，投向那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也许你喜欢影视、喜欢娱乐，那么你会看到美剧和“韩流”中折射出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也许你喜欢历史、喜欢旅行，那么你会发现古物流转中体现着国家的形象，你会听到来自大不列颠的晚风在呢喃昔日的荣光。你或许牵挂着至今失联的客机，或许期待着千年的丝路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国际关系变得不再冰冷和复杂，每个人都成为了世界体系参与者和创造者，参与着历史的书写，这个时代，让平凡的生命也有机会热烈地绽放。

而在北大的我们，也一样如此。《星空日记》里说，“不是现实支撑了梦想，而是梦想支撑了现实”。而正是这片园子，包容了我们的几乎每一个梦想。《经纬》创刊至今已有十余年，我有幸和她一起走过三年，见证她和我的共同的成长。从内容的调整与丰富，到美工的创新与成熟，再到发行方式的与时俱进，《经纬》作为一本学生团刊，承载的是一代代在新闻中心工作过的年轻人的努力与坚持。这里没有舞台上绚丽的灯光，有的只是多少次在老师办公室门前的守候和多少个深夜写稿、改稿、排版的汗水。谢谢你们，谢谢现在或曾经是这个团队的一员的，每一个你们。

铁打的是青春，流水的是我们。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我们这一批在《经纬》耕耘过的人们就要告别这个坚守了许久的阵地，而对于我们的继任者来说，新的梦想已经开始种下，将会在下一个秋天生根、发芽，长成茁壮。

祝《经纬》越办越好，祝新闻中心的你们可以写就更美的篇章。

祝从国关走出去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真的实现经天纬地的愿望。

祝这个世界可以承载更多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

再见。相信，还会再见。